

摩登都市与摩登女人——《长恨歌》中的上海书写与女性叙事

李 唯, 丁庆勇

文华学院中文系 湖北武汉

【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一个女人的命运为表、一个城市的形象为里,将女性叙事与城市书写熔铸为一体。通过对王琦瑶生命轨迹的书写,上海不再是冰冷的地理坐标或空洞的文化符号,而是被女性的身体经验、情感记忆与生存智慧激活的有温度的存在。小说从女性视角呈现城市叙事,又以城市的历史纵深反照女性的命运,最终在“女性—城市”的双向凝视中,完成了对现代都市文化性格的深度探索,也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范式。

【关键词】《长恨歌》; 都市文化; 女性叙事; 弄堂空间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7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6 日

【DOI】10.12208/j.ssr.20250416

Modern city and modern woman——Shanghai writing and women's narrative i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Wei Li, Qingyong D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wove together a woman's destiny with the essence of a city, merging female narratives with urban storytelling. Through chronicling Wang Qiyao's life journey, Shanghai became a vibrant entity animated by women's bodily experiences, emotional memories, and survival wisdom—a living presence brimming with warmth. It achieved a profound analysis of Shanghai's cultur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Wang Qiyao's life trajectory. The novel unfolded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while using the city's historical depth to reflect on women's destinies, constructing a unique narrative model of mutual gaze between women and the city.

【Keywords】"*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Urban culture; Female narrative; Lane space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涌入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女性主义与本土文化深度结合,推动“女性文学热”在 90 年代达到高潮。而在现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中,上海始终是最具文学张力的摩登都市,一直是作家们探索与描绘的焦点。王安忆的《长恨歌》既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关注,又扎根于上海深厚的文学传统,最终用王琦瑶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一个关于“人”与“城”相互映照、共同成长的故事,为中国城市文学的女性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1 女性叙事与城市书写的双向成就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编织的叙事世界,核心是女性命运与城市血脉的深度交织。她没有让王琦瑶的悲

欢简单成为时代的投影,而是让这个女人的生命轨迹与上海的城市气质相互渗透、彼此成就。王琦瑶的重要人生选择都刻着上海的印记,她的命运里沉淀着这座城市的呼吸;而她本人又像一面会呼吸的镜子,照见上海文化里那些说不尽的细腻与哀婉。同时,王琦瑶的每一次命运转折,皆是上海历史节点的微观显影。这种投影并非简单的时间对应,而是通过个人命运的起伏,折射出城市文化深层结构的特性,也暗含着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深层思考,最终成为解读上海城市精神的鲜活象征。

1.1 女性与城市的双向塑造

王安忆曾直言:“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

城市的历史。”^[1]王琦瑶从上海弄堂走出,她的衣着服饰、举手投足、情感选择,皆被深深地打上上海的烙印。参选上海小姐时的精明功利,是弄堂生存哲学的体现,她懂得如何用一袭旗袍、一支舞步换取关注,恰如弄堂里主妇们对柴米油盐的精打细算。在爱丽丝公寓中“心也甘情愿的囚禁”,则暗含上海作为冒险家乐园的物质主义特质,她沉溺于纸醉金迷的幻象,却也在虚荣中保持着清醒的算计。在平安里蛰居时,她通过“吃的国度”与“穿的时尚”实现精神自由,泡饭酱菜的烟火气里藏着对生活的韧性,旗袍的剪裁细节中透着对美的执着,这更是上海文化性格的具象化。最终,她成为了上海形象的“代言人”,让城市的文化性格在岁月的长卷中愈发生动鲜活。

同样,上海的兴衰发展也正是王琦瑶命运的镜像。小说中上海被描摹成“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2]的鲜活存在,而王琦瑶的一生,恰是这“大女人”的缩影,她的人生曲线与上海的城市命运同频共振。同时,弄堂里的吴佩珍、蒋丽莉、严师母,虽性格各异,却也都共享着与王琦瑶相似的生命轨迹。在时代洪流中,她们或许没有上海小姐的光环,却同样在柴米油盐中坚守体面,在悲欢离合中保持韧性。就像王安忆所写:“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2]因此王琦瑶的故事,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成为了城市文化的记忆集,让上海的文化性格有了血肉与温度。

1.2 个体命运与历史脉络的融合

小说以1946年和平气象远逝、1948年内战枪响、1957年炉边小天地、1966年秘密暴露等时间节点为坐标,将王琦瑶的少女、中年、暮年嵌入城市的历史时间。1948年李主任因空难离世,王琦瑶结束少女时代与外室生涯,这一转折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断裂点,更隐喻着上海殖民现代性的终结。曾以“孤岛繁华”自傲的十里洋场,随着战事推进逐渐褪去摩登外衣,暴露出底层生存的艰难。而20世纪80年代与老克腊的感情交易失败,则将她的衰老与老上海情调的幻灭交织,共同指向城市文化记忆的断裂……

这种个人与历史的深度融合,消融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割裂感,使宏阔的历史真正落地为个体的生命体验。王琦瑶的人生转折都成为了城市转型期的微观呈现,她的悲欢离合,也映照出上海逐步发展的足迹。如此,个体的悲欢不再只是私人的故事,

而成了承载发展变迁的活符号,让历史脉络在她的生命里有了可触可感的具象。

1.3 情感选择中的城市特性

王琦瑶与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的情感交集,常被视为解读上海城市文化特质的文学窗口。她对程、李二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生存策略的复杂性。程先生代表传统温情与稳定,李主任象征权势与物质保障。二者的张力像是近代上海转型期多重取向的缩影,展示出传统情义与现实法则动态平衡的理性状态。这种平衡中既有对利益的考量,也有对安全感的渴求,更有在时代洪流中对命运的被动与主动交织。

与康明逊的短暂真爱则折射出上海怀旧情结的矛盾性。康明逊对王琦瑶的情感源于对旧梦的怀恋,却因自私怯懦而逃避责任,这种爱而不得的困境,更像是上海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怀旧”与“现实”碰撞的形态。与老克腊的黄昏恋中,老克腊对老上海的追慕,反映出城市面貌剧烈变迁时个体的慌张与理想化。而王琦瑶的清醒算计与老克腊的怀旧痴迷形成对比与碰撞,似乎指向了上海的现代性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这些关系中普遍呈现模糊化、工具化的特征,王琦瑶始终是自己命运的主动博弈者,她“在恩和情之间划清界线”“用聪明才智沉稳求存”,甚至在死亡前“用金条试图留住陪伴”。这种韧性,或许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历史变迁中,既保持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文化性格的一种文学投射。

2 弄堂空间与女性话语的象征系统

王琦瑶与上海的双向塑造,其具体的载体正是上海特有的弄堂文化。弄堂,是上海的毛细血管,是市井的诗眼,更是《长恨歌》中女性生存与城市精神交织的纽带。它承载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基因,既非单纯的地理空间,亦非静止的文化符号,而是动态的、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象征。王安忆以弄堂为镜,照见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层心态;以女性为笔,书写的是超越时代的女性主体性。这种空间与话语的双重象征让我们看见,城市的魂魄不在地标,而在巷弄;女性的力量不在宣言,而在日常。

2.1 弄堂意象中的城市书写

《长恨歌》的上海书写绝非对城市景观的浮光掠影式描摹,而是以弄堂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空间为载体,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象征系统,成为探索城市文化的关键要素。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是性感的,带着肌肤之亲般的温热质感——它不仅是主人公王琦瑶赖以生

存的物质空间,更是上海文化深层心态的象征。弄堂又古老又摩登的独特气质,直接塑造了王琦瑶的性格基调,既保留着老上海的精致讲究,又浸润着现代都市的时髦气息。小说中,弄堂的日常性被细腻刻画为充满烟火气的生命场景:粪车的转轱声、刷马桶的清脆声响、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升腾的炊烟,共同编织成最真实的生活图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这些味觉记忆又构成了独特的生活美学。

这种对日常性的深度开掘,与传统文学中追求宏大叙事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当历史的大事件被悄然过滤为与个人相关的生活范畴时,弄堂里的女性群体却在琐碎无望的庸常生活里顽强地活出一点滋味。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女性的主体性恰恰在日常生活的表演中得以体现——王琦瑶在“吃的国度”里以一手好菜确证生活智慧,在“穿的时尚”中凭借对时装的独到见解展现审美前瞻性,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日常实践,她完成了对自我价值的深刻确认。

2.2 女性话语的中心叙事

弄堂的私语性是其文化性格中不可忽视的另一重要维度。小说中,上海弄堂里的闺阁,是专用来给女人们说知心话的场所,这种私密空间里流淌的流言蜚语,最终沉淀为弄堂里特有的“民间历史”。它不同于历史这类宏大概念,连野史都难称上,却在日复一日的絮叨中聚沙成塔,悄然凝聚着城市的文化记忆。这种私语性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男性话语权,将女性的边缘经验转化为中心叙事。

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的姐妹情谊,严家师母的“扯闲篇”,甚至弄堂里“老妈子一里一外的闲聊”,都构成了一套女性角色的话语系统。这套独特的女性话语系统,不追求传统史学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却以真实可感的细节、细腻入微的观察,还原了城市最本真的文化风貌。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对话中,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女性群体的生活智慧,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脉搏。它既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又蕴含着对现代的接纳,在烟火气与摩登感之间找到了微妙而坚韧的平衡。

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叙述,不仅记录了城市的变迁,更记录了女性在变迁中的适应与创造。她们在弄堂的烟火气中学会了精打细算,在时代的浪潮中学会了随机应变,在生活的褶皱里学会了苦中作乐。这种话语系统所承载的,不仅是女性的生活经验,更是上海这座城市最真实、最生动的文化记忆。它让我们看到,真正

的历史不是史书上的宏大叙事,而是弄堂里飘出的饭菜香,是妇人闲聊的吴侬软语,是孩子弄堂里奔跑的身影——这些才是城市最本真的文化基因。

3 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与当代启示

王安忆的《长恨歌》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不仅因其细腻描摹了上海的城市记忆与女性命运,更在于它以文学实践回应了如何叙事与为何叙事的根本命题。在前人的基础上,该作品既在叙事形式上有所探索,又在思想深度上穿透历史表象,探索了个体生存的本质。

3.1 叙事范式的创新

《长恨歌》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女性—城市”叙事范式的深化上。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常常被简化为被拯救者或被规训者,而王琦瑶既非激进的觉醒者,也非凄惨的受害者。这种中间状态的女性形象,恰恰更贴近现代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她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同时,小说也未选择沿用传统都市小说中男性视角下的城市见闻或女性视角下的个人情史等单一模式,而是将女性的生命经验与城市的文化记忆深度融合,升华了以女写城、以城观女的复合叙事。既为上海书写提供了更宽阔的维度,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拓展了边界。

3.2 生存本质的哲学启示

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与日常的辩证视角。在宏大历史叙事主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王安忆选择以女性的“日常生存”为切入点,实则是对历史本质的重新叩问。小说中王琦瑶的一生经历了抗战胜利、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节点,但这些大事件在她的生命中往往以被过滤的方式呈现。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她或是在爱丽丝公寓享受“温柔富贵乡”,或是在平安里经营“吃的国度”,抑或与老克腊演绎“黄昏恋”。这种历史日常化的叙事,并非消解历史的严肃性,而是揭示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历史不是事件的序列,而是日常生活的延续。王琦瑶的生存智慧恰恰在于她能在历史的缝隙中把日子细水长流地过着,这种坚韧,本身就是对历史暴力的温柔抵抗。

这种叙事策略对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城市书写不应局限于奇观展示或怀旧消费,而应深入城市的文化肌理;女性叙事不应停留于性别立场的简单表达,而应关注女性作为“人”的生命体验。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的今天,《长恨歌》的价值愈发凸显。它提醒我们,城市的精神内核不在地标建筑或经济数据中,而在寻常烟火气里;女性的主体觉醒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

选择,而是在复杂现实中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比完美的独立更具启示意义。

4 结语

《长恨歌》是一部用女性温度焐热城市的纪录。王安忆通过王琦瑶的生命轨迹,将女性书写与都市文化编织成一张精密的意义之网。女性不再是城市的他者,而是城市的主体;城市不再是女性的背景,而是女性的镜像。这种双向的塑造,不仅完成了对上海文化性格的深度剖析,更在“个人—城市—历史”的三重维度中,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本质。在琐碎中坚守,在孤独中坚韧,在错失中体验生命的滋味。这或许正是《长恨歌》最深刻的文学价值——它不仅是上海的“长恨歌”,更是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活出滋味”的普通人的心灵史诗。

参考文献

- [1]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91.
- [2]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52,21.
- [3]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长沙:岳麓书社,2024.
- [4] 贾丽萍.《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04):74-80+158.
- [5] 萧晓红.个体独立诉求与历史主体诉求间的裂痕——《长恨歌》里“王琦瑶”演绎的女性生存话语[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01):153-166.
- [6] 朱振武,杨赫怡.《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4):81-92.
- [7] 崔志远.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1):89-99.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2.01.003
- [8] 尹文灵.《长恨歌》的女性主体意识[J].新闻爱好者,2011,(16):122-123.DOI:10.16017/j.cnki.xwzhz.2011.16.009.
- [9] 吕佳.女性主义文学的书写——论《长恨歌》中的女性视角[J].名作欣赏,2011,(20):82-83.
- [10] 欧娟.人生长恨水流东——解读《长恨歌》的女性悲剧命运[J].名作欣赏,2007,(05):110-11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